

关于汉代的陶胎漆器

□ 王京燕 畅红霞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1]。《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这一段记载描绘出汉朝一统天下后,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山泽禁令,商贾辗转贸易,货物流通畅达,商品市场物品丰富的繁荣景象。商业的兴盛推动了种植业、手工业的发展。西汉时期“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陈于汉时为淮阳国,其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夏是现在的颍川和南阳)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2]种植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漆千斗……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3]手工业得到极大发展。规模化的生产有利于集中管理和产品的批量生产,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漆器制造业在西汉这种稳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下得到空前发展。

汉代漆的使用范围甚广,大到雕梁画栋,小到车马装饰、日常用器、佩饰玩好,无不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汉代的文献中也多有记载:“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桺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良民文杯画案”,“涂屏错跗”,“采画丹漆”^[4]。现在看到的汉代漆器的实物多出于墓葬中,不仅木质或夹贮胎的器物上髹漆彩画,有的铜器、陶器、骨器、兵器上也髹饰有漆。考古资料表明,西汉时期是漆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大中型墓葬中发现的漆器有几百件者,如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漆器五百多件^[5];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6];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7]。西汉墓葬中出土漆器以漆木器为主,有鼎、壶、钗、樽、耳杯、盘、盒、案、奩等生活用器。保存好的器物出土时光亮如新,纹饰繁缛,富于变化,图案布局合理,制作精良,色彩鲜艳,充分展示了当时的艺术成就。随着汉代社会的发展,墓葬形制的改变,随葬品也随之发生变化,至东汉时,随葬品中

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较西汉时大为减少,作为漆木器替代品的陶器耳杯、案、勺等风行一时,漆器制造业已经渡过了它的黄金时期。

汉代漆木器在出土器物中独领风骚,备受人们瞩目。相形之下,汉代墓葬中出土数量不多的陶胎漆器就显得暗淡无华。尽管出土陶胎漆器的数量有限,但在汉代不同时期,陶胎漆器在墓葬中数量的多寡、形制及用途的改变,直接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对漆器制造业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陶胎漆器在汉代不同时期墓葬中出现的器形的变化、作用、地域差别,并对漆器生产制作由盛转衰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西汉时期出土的陶胎漆器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西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陶胎漆器多见于四川、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等地。西汉早中期随葬器物组合遗留有战国墓葬的特点,随葬品中除漆木器外尚有仿青铜器的陶礼器,这一时期发现的陶胎漆器多为仿铜陶礼器鼎、盒、壶、罐等,多数是在器物表面简单地髹单色漆,也有的髹底漆后施彩绘。如阜阳双古堆西汉文帝时期的汝阴侯墓2号墓陶器鼎、盒、壶、罐内外髹黑色、褐色或棕色漆^[8]。徐州景帝时期宛朐侯刘執墓,出土的51件陶器多在器表髹黑漆,主要有鼎、盒、壶、钗等^[9]。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文景时期,墓主人属下级统治者的四号墓葬中,36件陶器中陶胎漆器多达21件,它们表里均髹红褐色漆,多是仿铜陶礼器^[10]。安徽六安九里沟两座西汉早期墓葬38件陶器中33件髹漆,M176的髹漆陶器均绘有精美纹饰,器形有鼎、盒、壶、盘、匜、杯等^[11]。此外还有长沙沙子塘^[12]、安徽霍山县^[13]、湖北江陵^[14]等西汉早期墓葬均出土有陶胎漆器。1983年在临沂金雀山发掘的西汉中晚期的六座中小型墓葬中,虽然墓葬形制较西汉早中期没有改变,但随葬品除漆木器、少量的铜铁玉器外,已少见前期墓葬中常见的有着固定组合的仿铜陶礼器,

仅有陶罐、壶等器物。六座墓中唯有 28 号墓出有两件髹赭色漆的陶罐^[15]。西汉中晚期出土陶胎漆器墓葬还见于四川绵阳^[16]、成都^[17]、江陵^[18]等地。

西汉早中期墓葬中陶胎漆器多是仿铜陶礼器鼎、盒、壶等。“古者……唯瑚琏觯豆而后雕文彤漆。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19]虽然是对当时奢靡风气的不满之语，但也说明古代宗庙祭祀的礼器是要雕饰纹画的。西汉早中期墓葬绘有彩色纹饰和髹漆的仿铜陶礼器正是这种礼制观念的产物。西汉中期以后，仿铜陶礼器渐趋消失，属明器性质的随葬品显著增多，如井、仓、灶等。这一时期的陶胎漆器并非特别局限于某种固定的器物，如成都洪家包西汉中期墓出土的髹漆卷口平底罐，器身内外壁髹了一层薄薄的黑漆，外壁又涂上一层赭彩^[20]。成都凤凰山西汉后期墓葬中的陶胎漆器则是鉴、钟、耳杯，其中的耳杯髹黑色漆，边上有简单红色花纹，明显仿自漆木器的耳杯^[21]。

以上出土陶胎漆器的地点都有发达的漆器制造业，成都是蜀郡的首县，蜀郡的官营漆器甚至远销海外。银雀山 4 号汉墓中，一件褐漆木耳杯有“莒市”戳记，西汉时期莒县属于城阳国，为城阳国治所，带有文字戳记的耳杯说明这些漆器是在莒县制造的^[22]。阜阳、江陵出土的漆木器上的文字也证明漆器是本地所产^[23]。陶胎漆器受地域所限，主要发现于宜于漆树生长的南方。随葬陶胎漆器的墓葬在同时期墓葬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主要发现于大中型墓葬中。西汉中后期，出现了富于生活气息的随葬品，墓葬中的陶胎漆器主要是用于盛储的陶罐。陶罐髹漆后不仅美观，而且防潮防渗，这或许是陶胎漆罐数量较多的原因。

二、东汉时期出土的陶胎漆器

东汉时墓葬中出土漆木器数量很少，即使负有盛名的漆器生产地四川也不例外。四川新莽时期墓葬出土随葬品主要有陶、铜器两大类，还有少量铁、银器等^[24]。漆器制造行业的凋敝，直接影响到漆的生产和使用。新莽、东汉时的陶胎漆器见于报道的有四川^[25]、河北^[26]、河南^[27]、宁夏^[28]等地，呈现出向北方地区蔓延之势，不同于西汉时期，主要集中于以南方为主的漆器制造地。宁夏盐池县张家场东汉初年的一号墓被盗，出土器物中的陶灶、甑、器盖均用漆彩绘^[29]。河南济源市东汉早中期之际的桐花沟十号墓，多数陶器的器表装饰有彩绘图案，施彩的方法，多

是在器表先涂一层深黑和黑灰的生漆类涂料为地，然后在深色地上作画，施彩器物有壶、盘、熏炉、奁、等^[30]。上述两个地点出土的陶胎漆器不限种类、用途，富于彩饰，可能是受西汉中期出现于北方的釉陶的影响。还有一类是有着固定的组合、用途，仿漆木器的陶胎漆器。随着漆木器数量的减少，西汉晚期就已出现的仿漆木器的陶器，如案、耳杯、盘、勺、樽等风靡于东汉。漆木器的案、耳杯等经常发现于西汉时期的大中型墓葬中，置于木椁墓的边箱内。西汉中晚期砖室墓开始出现，流行于东汉。砖室墓内有一定的空间，为墓内祭奠提供了条件。仿漆器的陶质盘、案、耳杯、勺、樽等就是墓中祭奠用具。祭奠用具一般置于棺前，洛阳五女冢 267 号新莽时代保存完好的砖室墓展示了墓内设奠的情况：室中部东侧为一影壁，西侧为一道小沟，将墓室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前堂和两层小砖砌成的祭台，北部西侧放置随葬品，东侧置棺。祭台上放置陶盒（内置耳杯）、陶案，案上摆放三排 15 件耳杯，其中陶盒和耳杯均内壁施红彩^[31]。考古资料显示的这些祭奠用器，有的朴素无华，有的耳杯、勺等涂朱彩，案上绘有简单纹饰，其中也有少量的陶胎漆器。如蠡县东汉中期砖室墓，早年被盗。陶器中四件陶案均朱漆彩绘，耳杯、勺、魁内涂朱^[32]。2009 年山西榆社河湟一座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陶胎漆器，均为泥质灰陶，有碗、盘、案、耳杯、樽、魁等，部分器物髹漆脱落^[33]。其中盘、碗漆绘保存较好。耳杯（图一）、魁（图二）等器物内壁髹朱漆，陶盘朱漆地上绘出数周黑色同心圆，边缘用黑漆绘出一周云气纹（图三），碗内外壁先髹深褐色底漆，再用朱漆绘出图案。外壁用朱漆绘出弦带纹，在上下弦带纹间填绘圆圈纹；内壁涂朱，碗底黑地上用朱漆绘出一周弦带纹，内填绘画气韵



图一 河湟 M1 3 耳杯



图二 河湟 M1 :4 陶魁



图四 河湟 M1 :1 碗



图三 河湟 M1 :2 盘

灵动的云气纹(图四)。可见陶胎漆碗的髹饰过程完全模仿漆木器的制作程序完成:在素胎上首先髹底漆,再髹丹漆,最后绘出图案花纹。这类属于祭奠用器的仿漆陶器已经是漆木器的替代品,与西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仿青铜礼器和用于盛储的陶胎漆器的作用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三、综 论

综上所述,西汉的陶胎漆器集中出现于南方,仅限于仿青铜礼器和盛储器,绝大多数是在陶胎表面简单地髹一层漆,只有少数器物是在漆地上绘彩。东汉时期陶胎漆器不受地域制约,常常发现于北方,比如宁夏盐池张家场一号墓。盐池县境内分布有盐湖,汉代在此设有盐官,墓葬中的陶器用漆当和此地曾是商业贸易中心有关^[34]。东汉的陶胎漆器大体分两类:一类受釉陶影响,施彩器物一般是象征性的明器,灶、甑、熏炉等;另一类是仿漆木器的墓内祭奠陶器,盘、案、耳杯、樽、魁等。这一时期出土的陶胎漆器从数量上来看,较西汉时大为减少。

至于漆器在东汉墓葬中骤减的原因,有社会动

乱、经济凋敝、砖室墓中漆器不宜保存、釉陶及瓷器的出现等诸多因素。但木材的不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漆器生产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的富足和安定、原材料的充裕。《盐铁论·散不足》有“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之语,侧面说明漆木器生产工艺复杂,组织严密,是由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组成的。从漆树的种植到精美漆器的完成,其中任何一个链条的脱节都是对漆器制造业的致命打击。而西汉奢靡的社会风气导致了对漆木器原材料的掠夺性使用。西汉中期有识之士的针砭时世之语“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35],已经表现出了对未来木材匮乏的担忧。东汉时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楠、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楠、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失,而东至乐浪,西达郭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36]和帝时(公元79—106年)为中山简王刘焉修陵墓时,“发常山、巨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37]木材的严重匮乏同样会影响到漆木器的产量,皇族墓葬中出现的仿漆木器的陶胎漆案^[38],说明漆木器的短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仿漆陶器由此应运而生,华丽登场,宣告了漆木器全盛时代的终结。

[1][2][3]《史记·货殖列传》。

[4]《盐铁论·本义》。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0期。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

文物出版社,1988年。

[7]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8]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9]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胸侯刘執墓》,《文物》1997年第2期。

[10] 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考古》1975年第6期。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市九里沟两座西汉墓》,《考古》2002年第2期。

[12]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霍山县西汉木椁墓》,《文物》1991年第9期。

[14]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

[15] 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

[16] 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文化局《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一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0期。

[17][21]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59年第8期。

[18] 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19][35] 《盐铁论·散不足》。

[20]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洪家包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

[22] 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1975年第6期。

[23] 洪石《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与管理》,《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24][25][32][38] 何志国《浅论四川地区王莽时期墓葬》,《考古》1996年第3期。

[26][3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蠡县汉墓发掘纪要》,《文物》1983年第6期。

[27][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济源市桐花沟十号汉墓》,《考古》2000年第2期。

[28][3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盐池县文体科《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第9期。

[3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五女冢267号新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7期。

[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资料。

[36]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37]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接15页)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10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东南薛家庄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12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10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年—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2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2] 段振美《殷墟考古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两座殷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14]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国立中央研究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3年。

[15]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6期。

[17]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12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

[18] 葛今《泾阳县高家堡早周墓葬发掘记》,《文物》1972年7期。

[19] 曹玮《西周时期的馈赠制度》,《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0] 杨晓能《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文物》2005年3期。

(作者系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